

叶舒·徐华炳：《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经费来源探析（1901—1966）》（下）

校舍，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戏剧公演。

2. 多姿多彩的教育夜市
所谓夜市，是指“在夜间开的一种游戏场”。在印尼，由华人向当地政府呈请申办的，称为“中华夜市”。中华夜市内，有一些是由华校发起的、旨在筹措教育经费的，此即“教育夜市”。教育夜市以商品义卖与活动表演为主要内容。商品展示方面，1904年即有诗文描述“琳琅满目义卖品，买卖兴隆靠情亲，当时真正好生理，义卖物品一扫尽”。在活动表演方面，1948年吧城教育夜市内，内有舞狮、爪哇戏、竹竿表演等多种娱乐活动。其中，源自印尼的爪哇戏“颇有艺术风味，士人不消说，大半侨生对这也是非常有兴趣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展示与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促使教育夜市成为一种寓慈善与娱乐于一体的社会经济活动。

正是由于教育夜市所寓含之社会经济属性，使其需集多方之力举办。“这个收入极大，但这并不是一个华校所能办的，所以所收入的款子得平分给所支持的各大机关”。因此教育夜市多为几所华校合办，或由社会机构主持。1904年，吧城中华会馆于10月5—7日举办了慈善教育夜市。1925年，三宝垄中华学校与华英中学合办夜市。1940年与1941年，雅加达中华中学为抗战举办两次慈善教育夜市。1948年集全雅加达华人之力，在该市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教育夜市，众多的华校参与其中。

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募捐活动的社会化，促进了华校的发展，并推促了教育与社会的关联。1948年集多方之力举办的吧城教育夜市，就彰显了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情态。“教育夜市在各方协助之下如期开幕，一方面显示出华侨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与提携，另一方面，充分表现着教育工作人员的目标一致，步伐整齐，自属可喜”。可见，借助于慈善群体所发起、组织的募捐活动，学校与社会交互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四、校董、师生及商家：教育与社会互动的中介者

慈善群体时常出现于筹募经费之活动内。他们为能筹得善款，时而游说于校园之内，时而奔走于社会之间。根据身份的不同，可将该类群体划分为华人精英、学校师生及在地商家三类。他们积极参与经费的募集/捐助活动，学校与社会因此产生联动关系。

（一）华人精英为能筹措经费，交互于华校与社会之间

华人精英在捐助和筹募华校经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校董作为学校的行政工作者，在筹措/捐助华校经费方面即扮演了重要角色。“校董负荷筹措经费的重任，若经费不充裕，学校便难以维持”。在捐资助学方面，1948年，时任巨港华侨交运委员会主席的黄洁，主动捐款40万盾，支持当地华侨中学的建立。在筹募经费方面，20世纪20年代，位于爪哇岛的士明山中华学校，每当经费不足之际，均由董事临时募集。50年代，吧中的董事群体为能筹集建校经费，多方奔走，出资出力。“当时刘家琪先生继任本校董事长兼建设委员会主任。会同当时的热心校董刘宜应、徐育梅、钟子秀、李金水、李昭欧、陈兴砚、丘元荣、麦燊煊、庄明耀、刘宏庆、刘润楠、邱蕴辉诸先生，热心奔走，出钱出力”。

借助经费捐助和筹募渠道，该群体促使学校与社会产生关联。一方面他们

将所得之社会利益用于维持华校正常运转。另一方面该群体为能募集充足之经费，走向社会，游说于不同群体之间。例如1910年，时任爪哇学务总会总理的陈显源，将他在马吉垄所包办的监狱饭、大彩票所获取的利润，用于维持爪哇华侨中学的运作。再如1947年，时任印尼明光中学校长的蔡奠华先生，在社会上为该校筹得图表、仪器、课桌等教学物资。华人精英在学校与社会间角色的切换，促使了教育与社会的交融，使华校与社会经济发生关联。

（二）学校师生通过演剧筹款，依此由华校步入社会

师生群体在筹募华校经费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积极捐助华校，进而表现对学校的热爱。如吧城中学在建设新校址的时候，该校学生会组织成立“协助建校委员会”，向同学们发起捐助学校“百盾运动”。据相关资料显示，该活动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不少的资金：“每位同学以募捐‘百盾’为目标，自捐或劝捐均可，一个月共捐到11.5万盾（荷币）”。另一方面师生们积极组织并参与游艺会、展览会等经费募集活动。如1948年吧城教育夜市的成绩展览馆内，展示了众多出自华校师生之手的手工艺品（例如刺绣、图画等）。琳琅的物品与精巧的手艺，令中国驻印尼领事蒋家栋及其夫人惊羡不已。

在组织募捐活动之际，师生群体即与在地社会发生互动。1947年吧城中学的学生自治会团体，在募集学校经费及慈善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七月间印荷冲突，内地侨胞遭受空前浩劫，本会首起呼吁，为内地同胞请命，除各级同学自动捐款外，复动员全校同学，分为一百小组，倾力向外劝捐。结果共得现款四万七百余盾，并衣服食品甚多，成绩为各社团冠”。再如该校的童子军团体，积极参与筹措学校经费、维持慈善活动秩序以及救济本土贫困群体。1950年，山口洋的南华中学与邦夏的华校师生群体，组成“山邦青年歌剧团”，他们所举办的剧目公演引起了当地社会的轰动：“剧团到来的消息传遍邻村……像是过唐人年一样高兴”。募捐活动的多样化与社会化，促使师生群体走向社会。寓善于乐、融教于善的社会活动，使在地社会更能了解华校的处境。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在此刻得以彰显。

（三）在地商家以捐资为媒介，进而沟通学校与社会之联系

社会人士亦会以捐助资金的形式影响华校。例如商家群体主要通过货捐及商店月捐的形式，为华校注入资金。1918年，时任学务总会的视学员熊理在调查爪哇华校时就发现，除固定学费以及董事月捐外，由商家提供的货捐亦是该岛学校经费

来源的重要渠道。1919年的荷属西部群岛，在地华校“多求助于商店，热心殷商月认一、二盾荷币以为常例”。1955年，印尼华商通过捐助物资的形式，以此庆祝吧城中学十周年庆典。

因此，华校发展与经济波动展现强烈共振性。倘若经济形势较好，华校经费便得到有效保障。一遇经济萧条，商家的捐助行为则必然缩减。“虽然，认捐与货捐之数量，常视人口货之多寡，与市场之盛衰为转移。故年内南洋各校，因受树胶锡跌落之影响面停闭或缩小范围者，时有所闻，甚非百年树人之永固办法也”。社会经济的波动，甚至影响了学校的发展。“今乃每年经费按店认捐，则学校所依赖者为个人，而个人所依赖者又为生意。而生意所依赖者又为商场情势。情势无变动，固然可保无虞；一旦情势不好，则直接影响于生意，生意若蒙损失亦即个人损失，个人损失当必间接影响于学校”。

回顾六十余年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华人精英、教师学生及在地商家群体尽自我绵薄之力，为华校捐助和筹募资金。经费问题不仅是影响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亦是维系教育与社会互动的必要纽带。以经费为契机，由此实现教育与社会互动，海外华文教育如此，国内教育亦然。

表4：1947年吧城中学童子军团体参与当地社会活动一览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说明
二月	不详	音乐演奏会筹募货捐	代售参观券，计得一千八百零一盾五纺
四月中旬	新华戏院	游艺会	协助装置舞台及维持秩序
六月十六、十七日	中华剧院	粤剧表演筹措经费	奉命维持秩序
七月七日	新华学校	该校四十一周年纪念游艺会	奉命维持秩序
七月三十一日	好丽安、中华两戏院	义演电影	负责售票及维持秩序
十二月	不详	义演电影	代售门票计得三千余盾

来源：巴城中学民国卅七年高初中毕业纪念刊编辑部：《巴城中学高初中毕业纪念刊》，内部刊印，1948年版，第17—18页。

表5：1955年印尼华商捐助吧城中学物品一览

商家名称	捐助金额	所在地	商家名称	捐助金额	所在地
永源有限公司	五千盾	雅加达	大益公司	一百盾	坤甸
协同昌宝号	五百盾	雅加达	中强公司	一百盾	坤甸
南光有限公司	三百盾	雅加达	广顺公司	二千盾	山口洋
雪山宝号	一百盾	雅加达	梁群兴兄弟公司	五百盾	邦夏
旺隆公司	一千盾	万隆	合盛棧	二百盾	邦夏
珠江宝号	二百五十盾	万隆	杏生堂	一百盾	邦夏
月利公司	一百盾	万隆	慕沙尼公司	五千盾	雅加达
永大有限公司	二百盾	坤甸	尚平有限公司	五千盾	雅加达
森峰木行	一百盾	坤甸	恒源有限公司	二千五百盾	雅加达
森丰公司	一百盾	坤甸			

来源：巴中十周年校庆委员会：《巴城中学十周年纪念特刊》，内部刊印，1955年版，第140页。